



“规则认同”与“目标认同”的平衡 英国保守党的意识形态转型

□ 宋雄伟

政党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受到两种认同的约束，即“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规则认同”主要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规则所赋予组织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认同；“目标认同”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现实中，政党组织在竞争的环境下总是不断地调整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在“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中寻找平衡点。

“规则认同”与“目标认同”的平衡：意识形态转型的四个评价标准

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作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政党政治的存在与政党认同的支撑相辅相成。从一个国家看，对某一政党的政党认同的高与低，直接反映了政党执政的心理基础和合法性支撑，甚至会导致政党的上台与下台。从世界范围来看，形塑政党认同有四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和政党绩效。这其中，政党意识形态无疑是塑造政党认同的灵感性要素，在政党认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党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要受到两种认同的约束，即“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规则认同”主要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规

则所赋予组织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认同；“目标认同”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现实中，政党组织在竞争的环境下总是不断地调整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在“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中寻找平衡点。因此，当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转型且重新定位时，必须要解释清楚转型的逻辑依据和本质内容，保持“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的平衡性，以保证社会大众的“规则认同”不会受到伤害。笔者在这里提出衡量和评价政党意识形态转型是否成功的四项标准：第一，通过建立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导致政党大选失利的、过时的政党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为了保持政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要追本溯源，寻求政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本源和真实性”；第三，在复杂的环境背景下，提出一个清晰、富有逻辑性的政策宣言和政策议程；第四，在与竞争对手的选举对抗中，获得政治话语上的优势。

英国保守党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与失败

2010年卡梅伦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并未赢得绝对多数，而不得不与自民党组阁形成“联合政府”。这样的结果既与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因素有关，更与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有关，甚至也成为影响保守党执政后民意调查不容乐观的重要因素。

其一，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因素。2005年卡梅伦提出让更多的妇女参与政治，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以及回到“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2006年，卡梅伦开始尝试将保守党定义为一个有“实质和内涵”的政党，而不只是躲在“口号和标语”后面的党派。卡梅伦开始发出“改变”的信号，强调保守党需要变化，旧的保守党必须进化，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向选民们有力地展示“旧的政治已经不会再回到保守党意识形态中”。2007年，在政策理念上，卡梅伦批判工党政府“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的国家治理方式”，坚持倡导“扁平的政府治理模式”。“以保守党的方式，达到进步的目的”成为卡梅伦2008年演讲的主打标语。这一标语旨在向选民展示保守党是一个不断进化、寻求改变的政党。保守党不是一个戴着“自由主义”标签的老政党，相反，保守党是一个新的政党，是代表社会正义的政党。卡梅伦政府提出英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破碎的社会”和“破碎的家庭”，并致力于以社会改革推动解决这些问题。2010年，卡梅伦推出“小国家，大社会”的治理理念，完全否定“保姆式国家”的治理方式，试图打破工党制造的繁冗、僵化的官僚层级体制。决心取消大量不必要的、遏制社会自身发展的政府规制等监督体系，创造出一种以家庭为核心，依托社区的社会自治方式，使国家尽可能扮演推动者的角色，而非非处处直

接干预。卡梅伦在阐述这个理念中，也时不时举出工党治理的失败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自2005年卡梅伦成为保守党领袖后，在政党意识形态转型和政党的重新定位上作出了重要调整。

其二，意识形态转型的困境。然而，在保守党意识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卡梅伦同样遇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给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型蒙上了阴影，也直接导致了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而不得不与自民党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

首先，2006年卡梅伦曾向外界透露出一种信号，称自己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继承人（Heir to Blair）。这一信息引起了保守党内部和外部选民的强烈震动和不安，使保守党内部人士和传统支持者认为卡梅伦意在推动保守党的意识形态转向“中间地带”，进而完全否定保守党的历史和传统。同时，对于“布莱尔”的暧昧也意味着卡梅伦对于撒切尔夫人所留下的政治遗产的摇摆不定。一方面，卡梅伦对撒切尔夫人的功绩和个人魅力大加赞赏，肯定她对于保守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回避1980年代由撒切尔夫人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私有化、金融化政策是造成后任工党政府不得不以借贷与透支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起始原因这一问题。在这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卡梅伦失去了向选民构建自己区别于撒切尔夫人时期意识形态的机会。

其次，卡梅伦指出了英国所存在的“社会排斥”和“社会系统紊乱”的社会问题，此后又一直强调“信任和责任”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公民“信任和责任”意识的发挥需要继承和发扬保守党传统思想“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默认“收缩政府的权力边界，前移社会力量的边界”为原则，强调“地方自治、自由、自我帮助、个人主义”的核心

要素。这使保守党的意识形态转型陷入了困境和矛盾。一方面强调要回到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信任和责任”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又要强调“父权式保守主义”所支撑的系统的政府干预，社会融合和责任感。这一时期，卡梅伦试图保持保守党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并寻求意识形态的“本源”，为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找到依据。然而，相互矛盾的本源却给保守党意识形态的转型带来了不小的危机。

再次，卡梅伦对于布莱尔的暧昧情结，对于撒切尔夫人政治遗产的摇摆不定，以及对于寻求保守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根源的多重性，直接导致保守党未能及时提出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清晰的、富有逻辑性的政策宣言和政策纲领。面对“破碎社会”的问题，卡梅伦提出了以“大社会”来取代“大政府”的理念。2007年后，卡梅伦先提出“合作运动”，后又提出“大社会”的理念，强调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回归，而不是受制于巨大的国家机器。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破碎的社会”本身内含了“社会”所存在的能力问题，暗含着“如果社会有病，社会是破碎的，社会又如何有能力来依靠社会的责任解决自身问题”，似乎还需要向“国家干预”去寻找答案，需要政府培育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并创造社会成员承担责任的条件。

卡梅伦在推动保守党意识形态转型中并没有实质性地形成绝对的政治话语优势，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既区别于工党，又区别于其前任政府理念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徘徊中失去了清晰定位保守党意识形态的机会。



他山之石

欧洲保理业务的成功实践与启示

□ 徐德顺

全球保理业务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但如今欧洲保理业务发展最为成熟。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为打开北美市场，许多欧洲商人在当地寻找商务代理评估客户资信，并以委托人的身份以寄售方式代为销售货物。许多实力雄厚的保理公司应运而生，不仅提供商务代理业务，还凭寄售货物提供融资并拥有货物的留置权。19世纪末欧洲保理业务得到快速发展，保理商有权收取欠款并作为自己的资产对待，出口商也不再要求保理商寻找客户和推销，只是让保理商核准客户的信用额度同时提供坏账担保，保理业务正式形成。

国际权威机构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7至2015年全球保理业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82%，2015年末其会员单位业务规模达到237万亿欧元，其中国内保理和国际保理分别占比78%和22%。分区域来看，欧洲占全球保理业务的66%，亚洲作为全球保理第二大市场，占比24%。在业务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欧洲有7个，其中英国表现最为突出，在欧洲整体的保理业务规模中占比近四分之一。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理的“原材料”——企业应收账款数额巨大，2015年末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总额就达11.45万亿元，占其流动资产比重高达24.86%。相应的我国保理业务总量在全球排名靠前，根据FCI统计，我国大陆地区保理业务规模2011至2014年均位列世界第一，2015年位列世界第二。总体来看，我国保理业务市场需求旺盛，发展速度迅猛，但发展质态还有待提升。借鉴欧洲成熟保理市场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洲地区是全球保理行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社会信用环境较好，技术平台系统、风险控制系统都比较发达，一直保持保理业务领头羊地位。主要发展特点有：一是行业集中度较高。欧洲保理公司大多隶属于银行旗下或有银行参股，超过90%的保理业务由商业银行所属分支机构操作完成。截至2015年底，英德两国分别拥有保理商数量49家、190家，其中前10家企业占据80%的市场份额；法国保理商总数12家，前3家企业占据80%的份额。二是保理产品丰富。传统的出口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是主营业务，发展最快。同时，欧洲保理商不断开发金融创新产品与传统的保理业务融合，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在国际双保理模式下，出口保理商帮助出口企业进行短期贸易融资，进口保理商评估调查进口企业的资信

情况以及提供坏账担保。三是保理产品客户定位在中小企业。欧洲国家具有良好的市场营销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保理公司能够通过第三方信用评级公司、政府公示平台和社会资信平台等搜集融资企业信息，合理确定融资产品价格，降低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四是完善的法律体系。英国法律认为保理的本质是通过让与的方式实现应收账款债权的转移，适用通知优先原则来规范保理业务。《德国民法典》第398条规定，德国的债权转让行为采取“自由主义”原则，将债权转让视为一个准物权行为，从债权转让合同生效时即发生对外效力，并不受是否通知债务人的影响。在债权争议中以签约时间先后认定债权的优先性。德国对于债权转让的限制是最小的，简便易行，最大程度保护了受让人的利益。法国法律中没有对保理业务的特别立法规制，主要以债权让与和约定代位两种方式进行应收账款转让方面的相关制度约束。

保理行业具有逆经济周期的发展特点。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业务量累计达到3万亿元，渗透率（占同期本国GDP比重）约4.43%，略高于全球平均渗透率10.16%的水平。尤其与欧洲地区保理业务发展质量相比，我国仍存在明显不足。为此，比较欧洲保理业务的发展经验，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一是保理机构自身要坚持正确的市场定位，加大保理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力度。我国保理虽然从业务量上实现了突破，但整体保理市场的开发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认可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具体表现在“三多三少”：国内保理业务多，国际保理业务少；融资保理产品多，非融资保理服务少；有追索权保理产品多，无追索权保理产品少。今后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保理产品的开发力度，坚持服务于成长型中小企业，缓解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坚持回归保理业务本源属性，更多发展无追索权产品业务，更多发展非融资保理业务服务，积极推行国内与国际双保理业务，满足客户多层次业务需求。努力提高从业人员专业化服务水平，重视应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完善信用风险评估管理模型，简化业务操作流程，降低目前偏高的融资利率及非融资服务成本。

二是行业协会加强业务指导与服务，培育更多专营保理业务的百年老店。银行业保理协会和商业保理协会加强沟通与联系，形

成合力，为行业发展创造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有效发挥行业协会指导作用，进一步细分保理业务市场，开展特色化、专业化、国际化服务，培育更多的专营保理业务的商业机构。探索行业文明服务规范，推动建立行业标准、自律条约、争议解决机制，促进同业公平有序竞争，健康发展。加强对会员单位的人才培养与教育，设立关键从业人员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整体业务素质。

三是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健全保理监督管理体系，从行业准入与退出、业务内容和风险监控等方面加强监管以化解风险。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发挥商业银行保理业务主渠道功能，鼓励更多的中小银行涉足保理业务，促进保理业务持续发展。依据《国际保理公约》和《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保理业务管理法规和操作细则。尽快出台《商业保理企业管理办法》，规范商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督促保理机构拓宽自身融资渠道，提高非融资类保理业务的比重与专业水平。切实加强对保理机构风险预警与控制管理，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支持新业务的开展，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

四是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保理业务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加快保理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可以考虑允许保理机构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共享信用信息资源。建立保理行业黑名单制度，借助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力量，对保理业务中存在的严重诚信和道德问题进行曝光。规范征信、信用评级与认证等机构业务行为，为保理业务拓展提供可靠的信用服务，促进供应链金融与经济健康发展。

名词解释

保理业务是指卖方、供应商或出口商与保理商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契约，卖方、供应商或出口商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或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其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的催收、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等服务中的至少两项。

继不久前日本APA酒店社长元谷外志雄将其著书放置在酒店客房出售，书中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所引发的巨大风波后，位于大阪市的塚本幼儿园又被曝出针对幼儿进行反中、反韩等右翼史观教育。接二连三出现的右翼史观蔓延现象不得不让人对于未来日本社会的走向表示担忧。右翼史观的甚嚣尘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逐渐呈现的右倾化趋势，与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知与政策密切相关。

右翼史观渗透校园，与二战前“皇民”教育如出一辙。此次所曝光的塚本幼儿园与一直以来广为国际社会诟病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不同，教授对象是心灵如同白纸般的幼童，其所宣扬的错误史观，在二战结束70多年的今天更是让人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仿佛回到了日本二战前。在这所学校，孩子们每天向天皇像鞠躬、背诵早已于1948年被废除的《教育敕语》。学校定期组织孩童参加政治集会、散播宣扬针对中韩的侮辱性宣传材料，处处彰显所谓的“皇国史观”“国家神道”。这些早已经被历史扫进垃圾堆的东西被曝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外界纷纷批判此举是在戕害孩子的幼小心灵。事件发生后国方发表了一个所谓的道歉声明，一面声称“对存在招致外国人误解的表现表示歉意”，一面又说“对于恶意的批评，今后将继续坚持坚决斗争的姿态”，其顽固立场可见一斑。近年来日本社会逐渐呈现右倾化趋势，对于右翼错误史观也逐步展现出纵容的态度，很多人认为日本若想要走向正常化国家就要甩掉历史包袱。在这样的国民心态下，任何企图散播错误史观的行为都应该值得警惕。

右翼教育“样板”，安倍政权难脱干系。虽为私立，该幼儿园却与安倍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幼儿的右翼史观教育，与其说是园方个体行为，倒不如说是右翼势力精心打造的一所右翼“样板”幼儿园，园方的教育理念与安倍本人的历史观高度契合。幼儿园所灌输的右翼史观得到了安倍本人的默许。其夫人安倍昭惠曾于2014年到访过该学校，在园长的诱导下，孩童们齐声称赞安倍为“保卫日本的人”，安倍昭惠还对园方表示安倍本人对其教育方针很认可。幼儿园为了能够确保继续对这些孩子进行灌输教育，正在筹建森友学园小学，以“安倍晋三纪念小学”的名义进行建校募款，邀请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亲任名誉校长，并且被外界揭露出不当获得国有土地，以约市面价格1/10的低价购得建校用地。安倍与这所学校的联系并不能说是巧合，在知晓学校教育理念是错误的状况下仍明里暗里对学校的发展给予支持，充分暴露了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企图，即不断营造右倾化的社会氛围推动实现其政治理念，同时为右翼团体和组织提供政权依附。

右翼行径频出，日本动向值得警惕。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共识，不只在政府层面，民间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也十分复杂。对于不断上演的右翼横行闹剧，日本政府一直以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借口敷衍外界批评，

警惕日本右翼史观蔓延

时评

侯隽

展现了日本在历史认识与战争责任问题上极端不负责任的认知态度。二战后碍于法律与舆论压力，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政府官员在战争责任与历史问题上的发言相对谨慎。然而近年来日本社会对于否认战争与历史责任的言行愈发纵容，一大批在历史问题上屡放厥词的政客大行其道，错误言行甚至成为其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比如前任大阪市长桥下彻、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防卫省长官稻田朋美、副首相麻生太郎等，这些政客在日本政坛都称得上语不惊人死不休，充分反映了日本社会加速右倾化的趋势，右翼史观渗透至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今的安倍政权更是日本右翼史观的最大推手，其为了实现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需要在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方方面面实现对日本的改造。因此，此次大阪塚本幼儿园事件并非孤立的个案，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日本社会右翼史观蔓延至各领域的体现。值得玩味的是，随着事件不断发展，舆论的关注焦点逐渐转向安倍政权同大阪塚本幼儿园不当获取国有土地一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国会议员连日也对安倍进行轮番激烈的质询，而对于幼儿园进行右翼教育一事却鲜有提及。日本社会右翼思潮的蔓延应该引起国际社会警惕。